

离散中的记忆与见证——郁达夫南洋散文的情感解读

曹一蔓

（燕山大学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自 1938 年底烽火南渡至新加坡，到 1942 年初迫于战局撤离，星洲三载成为郁达夫文学生涯中最后一个特殊且完整的阶段。这一时期，他几乎所有重要散文作品均发表于新马华文报刊，在南洋语境中实现了个人情感与宏大历史的交织表达。但这场国难与家变交织着的双重离散，使这场本意是建一座抗战宣传“文化中继站”的南下之旅，添上了更为复杂的心理底色。其后的书写也大多围绕南洋展开，若将这些文字放回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细品，会发现其远非单纯的个人感怀，《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上那些散落的篇章，既记录了一位流亡文人在战火中的心灵记忆，也以文学的方式见证了抗战时期南洋的社会生活与历史书写。本文以“情感”为线索，聚焦于此期间郁达夫创作的散文，尝试厘清其在南洋的特殊语境下所展示的复杂情感。

关键字：郁达夫；南洋散文；离散；情感

1 引言

1938 年底，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南下抵达新加坡，这一年他四十二岁，距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已一年有余，距离他的《沉沦》发表已过十七年，而与妻子王映霞的婚变，却不过数月。这场“南渡”，既是地理上的远行，也是其人生与创作的重大转折。在新加坡的三年，郁达夫小说的创作出现中断，但他主编《星洲日报》等多家报刊副刊，并在此期间写下大量政论、杂文与散文。相较于其早期“自叙传”小说的感伤颓废和 30 年代游记的潇洒名士风，这批南洋散文呈现出迥异的面貌。学界目前对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散文已有一定关注，代表有蒋成德曾初谈和漫谈郁达夫南洋散文，将其分为记游、记事、记人三类，指出其“以抗战为中心”^[1]的主题特征。但郁达夫在南洋书写的散文情感的复杂性，以及其作为历史见证的独特价值，仍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

郁达夫新加坡散文中的情感世界，不单单只是“爱国”二字。它是在“离家”与“去国”的双重离散中生成的，是由远望故国的忧思、缅怀传统的乡愁，以及逐渐融入南洋本土的认同感，这三股力量共同塑造的，正是这些复杂情感，使这批散文具有了超越个人抒怀的分析价值。理解郁达夫作为战时知识分子在新加坡散文的书写，既是理解郁达夫后期思想与创作转型的关键，也是我们窥见战时南洋华侨社会的一个独特文学窗口。

2 双重离散：国难与家变中的流亡书写

抵达新加坡之初，郁达夫正处于“国”与“家”双重离散^[2]的境遇之中，国族层面，日本全面侵华，国

作者简介：曹一蔓（2002—），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在读硕士，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土沦丧，他远赴南洋开辟抗战宣传阵地。个人层面，与王映霞的婚变在 1939 年以《毁家诗纪》公之于世，家庭破碎，这两种离散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他南洋散文最深切的情感底色。

在国族层面，郁达夫的离散体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古代文人因仕途失意或战乱避祸而被迫离乡不同，郁达夫的南渡带有主动的抗战使命。他在接编《晨星》时明确表示，希望“在海外建立一座文化中继站”^[3]，为抗战宣传效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超越离散者的普遍困境。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主动”与“被迫”之间的张力，使其散文呈现出复杂的情感层次。他在《岁朝新语》中便宣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必胜论者”^[3]，其爱国热忱与抗战必胜的信念，也可见于诸多政论和散文中。在《估敌》一文中，他更明确写道：“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4]。然而，这份激昂背后，是更为深沉复杂的忧思。这段叙述看似平实，实则暗含着对“归”与“去”的深切焦虑——即便身处南洋，他的心始终系于故土。

而在他的记游名篇中，这种情感往往借景物触发，他散文中常见的残山剩水意象，既是国难当头的现实写照，也暗合了个体伦理创伤的转喻，以诗化的方式呈现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的沉郁底色。郁达夫在《槟城三宿记》《马六甲游记》中惯以“失根者”姿态出现，既感慨故园归去已无家，又把南洋风景拟像化为杭州西湖、绍兴沈园。《槟城三宿记》中郁达夫初游“东方花县”槟榔屿，沉醉于异域风光。然而，当登上升旗山，友人一句“这景象有点儿象庐山，大好河山，要几时才收复得来！”^[3]的感叹，瞬间使其情感由陶醉转为深沉。眼前的南国秋菊，瞬间与梦中的庐山叠印，化作忧国的符号。他随即吟出的“好山多半被云遮，北望中原路正赊”^[3]，其情感之深沉，已非单纯的山水吟咏，而是北望中原的游子悲歌。郁达夫采取了一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情感表达，将个人忧思附着于友人的感叹，从而在不直接宣示悲观的前提下，完成了忧患情感的释放。其后的《马六甲游记》更是如此，面对圣保罗教堂的颓垣残壁与三保公郑和的遗迹，当熟悉的中华历史记忆与南洋殖民废墟相遇时，反而强化了现实的失落感。他抚今追昔，痛感“大陆国民不善经营海外殖民事业的缺憾”^[3]，将历史的沧桑与现实的国难紧密相连。这种由景入情、由情及史的写法，使其游记摆脱了 30 年代的闲适隐逸，而带有陆游南渡诗人般的忧国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国之思，始终与个人的流亡体验缠绕在一起。个人层面的则更隐秘而深刻，1939 年，郁达夫在《大风》旬刊上发表《毁家诗纪》，将其婚变公之于世，这一事件不仅是其私人生活的转折，也影响了他的散文书写。如“想起了故国的日暮秋深，更使我这沦落天涯的游子，感到了百年身世的悲哀”^[5]，这里的“沦落天涯”，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流浪，也是情感上的失落。个人的“毁家”之痛与国家的“亡国”之危^[6]，在郁达夫笔下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互喻关系，国的破碎映照家散，家的破碎又成为国难的个人化转喻，正是这种双重创伤的文学表达。

与三十年代那些潇洒出尘的游记相比，郁达夫南洋散文中的情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7]前者如《钓台的春昼》《杭州的八月》等，虽有忧时伤世之感，但整体上是保持着一种名士派的超然姿态的，仍是一种属于文人的有距离的关切。而在南洋，这种超然与距离不复存在，他的文字中存在着欣喜与伤感、信念与忧思、个人哀痛与国族悲愤，这些情感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并置、交替、融合，构成了郁达夫丰富而深沉的情感世界。

3 文化乡愁：从故国遥望到南洋扎根

作为深受古典文化浸润的文人，郁达夫在南洋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也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乡愁”^[8]。这首先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坚守与缅怀。在《槟城三宿记》中，他信手拈来杨士奇的诗句“绝似河阳县里居”¹来形容眼前景色，在与友人的唱和中，旧体诗更是其感怀时局、抒发胸臆的主要载体。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频繁引用，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更是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维系文化血脉的精神实践。

这种文化乡愁最初带来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慰藉。面对陌生的热带殖民空间，郁达夫将槟城比作河阳县里居，将升旗山的风光联想为庐山，其实质是将陌生的异域空间“再熟悉化”，使异乡变得亲切可居。这种情感调节，让作者在流亡中获得了片刻的安宁。郁达夫在接触存在差异的异域文化时，难免会产生迷茫并需要进行自我调适的，我们也能在他的笔下感受到他对不同文化碰撞的思考，既有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也有因文化差异产生的困惑。比如他对马六甲古城中不同风格建筑并存的描写，表现出他对文化融合现象的观察，以及在文化冲突中试图找到平衡与认同的努力，以往多强调郁达夫难以融入星洲华人社会。但他很快学会以“峇峇—娘惹”饮食、闽南语地名、热带植物入文，并借题发挥“南洋色彩”对抗殖民教育中的帝国话语。这种由客而主的情感转向，使散文成为马来亚本土文化建构的早期资源，这也是一种独特表现形式。

但其实这种情感在他对故国文人的悼念与书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回忆鲁迅》无疑是巅峰之作。这篇长文采用笔记体，撷取与鲁迅交往中的生活片段，从日常琐事着笔，写抽烟、喝酒、爱子等细节，却生动地勾勒出鲁迅作为“平凡人”与“伟人”的双重形象^[2]，并且亲切而鲜活。他写鲁迅的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5]；写鲁迅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时的慈爱；写鲁迅谈论自己“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的幽默。这种写法之灵动、观察之入微、情感之真挚，在众多回忆鲁迅的文章中独树一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并未将鲁迅神化，而是通过日常细节呈现其可亲可敬的一面。这不仅是对亡友的怀念，更是对五四文化精神的遥祭——在远离故土的外南洋，维系这缕文化香火，维系自身与故国文化的精神联系。

此外，他为徐悲鸿、刘海粟、许地山、郭沫若等人写下的篇章，同样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艺术家“以艺报国”^[9]精神的赞扬。在《与悲鸿的再遇》中，他评徐悲鸿的画，赞其背后艺术报国的苦心；他论刘海粟的义举，肯定其为国家筹得赈款的实际贡献；他祝郭沫若寿辰，更看重其抛妻别子、回国抗战的壮举。这批文章，为后世勾勒出一幅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人南来星洲、以各自方式报效国家的群像图。可以说，这些记人散文，是郁达夫通过书写那些同样在离散中坚守文化使命的人，也确认了自己的文化立场与精神归属。

然而，郁达夫的文化乡愁并非简单的怀旧或保守，他同时表现出对南洋本土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当地文人在作品中也曾描述过郁达夫虽常流露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但与南洋友人相处时，亦能感受到他对这里人民的真诚喜爱。郁达夫在《印人张斯仁先生》中，高度评价这位梅县籍篆刻家的“以艺报国”精神，认为“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3]。在《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中，记述了一位从北

¹ 郁风. 郁达夫海外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0:277-280.

伐年代成长起来的粤曲歌者如何在抗战中“变成了一个晓得为国家民族竭尽全力的好国民”^[3]。这些文字表明，郁达夫的文化认同并非排他性的，他能够在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同时，欣赏和吸纳南洋华人社群的文化创造。更重要的是，作为《晨星》《繁星》等副刊的主编，他投入大量心血培养本地文艺青年，如苗秀、冯蕉衣、王君实等。这种文学上的传道授业，让他与这片土地建立了深刻的精神联结。他在《悼诗人冯蕉衣》中对这位年仅 27 岁的本地青年诗人的去世，表达了深切的痛惜与怀念，这显然已超越了一个外来者对陌生人的同情，已经成为一种基于共同文学志业的情感共鸣。

他曾言“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10]，正是这种对南洋本土文艺发展的深切期待和实际投入，构成了他南洋本土情感最坚实的内核。也让他的散文，从单纯的“客居”者的观察，转变为一种带有交融温度的“在地”书写。

这种文化乡愁与在地情怀之间的张力，恰恰是郁达夫南洋散文情感结构的独特之处。他既不是那种一味怀旧、拒绝融入的“侨民”，也不是那种迅速同化、遗忘故土的“移民”。他始终处于两者之间——在异乡思念故国，又在故国的文化记忆中寻找与异乡对话的可能，身在南洋，而心系故国，这种处于“之间”的状态，正是离散者最真实的情感处境。

4 离散中的记忆与见证

这一时期的散文，也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记录，更是一份具有历史价值的时代证言^[11]。郁达夫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侧面记录了时代风云与社会百态。

郁达夫的悼亡文章《悼胞兄曼陀》与《悼诗人冯蕉衣》两篇，分别写于 1940 年和 1941 年，前者悼念被汉奸暗杀的兄长郁曼陀，后者悼念贫病交加而早逝的南洋青年诗人冯蕉衣。在《悼胞兄曼陀》中，郁达夫以一种克制到近乎平淡的笔调，叙述了兄长生平与遇难的经过。他说：“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3]然而，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更深沉的情感表达——当个人哀痛被置入民族苦难的大背景中，它不是被稀释了，而是被赋予了更重的分量。他还曾提及母亲同样在战争中遇难，但“亦只痛哭了一场，设灵遥祭了一番，而终于没有心情来撰文以志痛”^[3]。这种“不写”，比洋洋洒洒的悼文更令人动容。最后他写下挽联字字沉痛，句句凛然，将家仇国恨凝于笔端。《悼诗人冯蕉衣》中他写道：“他的死，是极不自然的，是直接受了社会的虐待，间接地系受了敌人侵略而致有此结果的死。”^[3]他将一位本地青年的死亡，同样归因于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灾难，在郁达夫眼中，这位南洋青年的命运，与故国同胞的命运是相通的，将一个人的早逝，转化为对那个时代所有被战争与贫困吞噬的年轻生命的集体哀悼。

在这些“见证”的散文中，郁达夫常常不是亲历者，而是转述者，这也体现在他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中。在《覆车小记》中，他记叙了一次火车出轨的惊险经历，于惊险之中保持镇定，与马来路工交涉搬运行李时把孔方兄一讽，颇具意趣。在《在警报声里》中，他追记在徐州劳军时听池峰城师长讲述台儿庄战役的经历，刻画了一位爱国农妇冒死渡河报告敌情、四十七位勇士英勇牺牲的故事。文章的结尾高呼“我们一定要为勇士复仇！复仇！复仇！”^[3]这已不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全民族抗战意志的文学表达。

但其中也有一些沉默的地方。他几乎不写马来人、不写殖民政府、不写种族矛盾。他的“南洋”是一个华人南洋：那里有华侨文艺青年、有筹赈活动、有中国画家的展览。为什么他不写那些？也许是因为他更关注与自己文化血脉相连的人和事，也许是因为他无法将自己置入一个多元种族的复杂场域中书写。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情感选择，也揭示了一个离散者的情感世界可能存在的边界。但即便有这些沉默，他写下的那些文字，已经足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在战火与流亡中依然保持真诚、保持温度的灵魂。

这批散文也因而具有了双重价值：一方面，它们是以文学方式记录战时南洋社会生活的“历史档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侨社会的抗战热情、文艺青年的创作状况、南来文人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一个离散文人在异乡寻找情感锚点的精神记录——通过书写他人的命运，他确认了自己的位置与使命。^[12]郁达夫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不自觉的历史记录者。他留下的那些散文，是他个人情感的真诚表达，也是一个时代的珍贵证词。

5 结 论

“离散”指向郁达夫的生存处境——国难与家变交织，使他处于身份悬置的状态。“记忆”是其散文的情感内核，家国之思、文化乡愁、在地情感三重维度交织缠绕。“见证”则是其散文的历史功能——这些文字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了战时南洋的社会百态。三者相互渗透，在离散中记忆，在记忆中见证。

从“感伤的行旅”到“履痕处处”，再到南洋时期的战地书写，郁达夫的散文之路，也是一条不断走出自我、走向时代与人民的精神之路。鲁迅曾劝他不要迁居杭州，他后来悔于没听鲁迅的话；但他听了另一句话——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做一个以笔为枪的战士。南洋三年，他做到了。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是其生命最后的华章，也是其文学创作一次深刻的转型与升华。他的散文，不再是早期自传体小说中那个“零余者”的哀怨呻吟，也不再是30年代游记中潇洒出尘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时代洪流与个人命运的激荡中，凝练而成的一曲沉郁而嘹亮的战歌。

从这个意义上说，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散文，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巅峰之一，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抗战书写的重要篇章，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与深入研究的文学遗产。

参考文献:

- [1] 蒋成德. 郁达夫南洋散文初评[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01):75-78.
- [2] 许子东. 郁达夫新论[M]. 浙江: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 [3] 郁风. 郁达夫海外文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0.
- [4] 刘涛, 沈小惠. 郁达夫新加坡文集(上册)[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 [5] 刘涛, 沈小惠. 郁达夫新加坡文集(下册)[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 [6] 苏云. 论郁达夫散文创作中的“自我”抒情建构[D].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31-43.
- [7] 宫淑芝. 郁达夫游记散文的艺术特色[J]. 芒种, 2014,(09):187-188.
- [8] 熊小菊. 南国风光家国情——解读郁达夫的《槟城三记》《马六甲游记》[J].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1):103-106.
- [9] 刘瑛. 郁达夫散文创作中的爱国情怀[J]. 文化学刊, 2018,(11):49-54.
- [10] 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 中外郁达夫研究文论选[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陈柯桦, 刘一静. 探究郁达夫散文的自然书写[J]. 散文百家(理论), 2022,(01):154-156.
- [12] 张梦阳. 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4,(02):195-212.

Memory and Witness in Displacement: An Emo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Yu Dafu's Nanyang Essays

CAO Yiman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fiery escape to Singapore at the end of 1938 to the forced evacuation in early 1942 due to wartime conditions, the three years in Nanyang became the last special and complete phase of Yu Dafu's literary career. During this period, almost all of his important essays were published i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achieving an intertwined expression of personal emotions and grand historical events within the Nanyang context. However, the dual displacement caused by national disaster and family upheaval added a more complex psychological layer to this southward journey, originally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cultural relay station" for anti-war propaganda. Most of his subsequent writings still focused on Nanyang. When these texts are examined in thei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y are far from mere personal musings. The scattered pieces in the Xingzhou Daily and Nanyang Commercial Daily not only record the spiritual memories of an exiled writer amidst the flames of war but also, in a literary way, bear witness to the social lif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Nanyang during the war. This paper traces "emotion" as its thread, focusing on Yu Dafu's essays written during this period and attempting to clarify the complex emotions they reveal in the unique Nanyang context.

Keywords: Yu Dafu; Nanyang essays; displacement; emotion